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 反动本质

北京维尼纶厂工人国际形势研究小组
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国际形势研究小组

商 务 印 书 馆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 反动本质

北京维尼纶厂工人国际形势研究小组
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国际形势研究小组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只限国内发行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
反动本质

北京维尼纶厂工人国际形势研究小组
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国际形势研究小组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4225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27/8。印张 45千字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190 定价：0.17元

目 录

一、苏联已经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 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2
(一)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3
(二) 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加强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	13
(三) 苏修叛徒集团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 各族人民	37
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最凶恶 的敌人	44
(一)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又一个最大的国际 剥削者和压迫者	45
(二)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新的世界战争最 危险的策源地	56
三、苏修叛徒集团内外交困,处于“无可奈何 花落去”的境地	63
(一) 苏联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64

(二) 苏联人民反抗苏修叛徒集团的革命斗争 不断发展	70
(三)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处在世界人民的重重 包围之中	73
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80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国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沉痛的教训。研究苏修叛徒集团是怎样上台的，总结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对于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开展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保证我们的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① 研究苏联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教训，揭露苏修叛徒集团执行侵略扩张政策和世界霸权政策，认清苏修新沙皇的反动本质，对我们坚持国际主义，永远同世界人民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在地

^① 见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

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苏联已经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三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取得了战胜白卫军叛乱和十四个国家武装干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粉碎党内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一九五三年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逝世以后，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乘机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改变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在苏联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十月革命的道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二十大到一九六一年的二十二大，系统地形成了一条“三和”、“两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即所谓的“和平过

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路线。他们在“全民党”的幌子下，把苏联共产党变成法西斯的党。他们在“全民国家”的幌子下，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他们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把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幌子下，破坏世界人民的革命，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霸权主义的政策。二十几年来，苏修叛徒集团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一)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会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呢？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产生，是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的。毛主席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苏联修正主义上台，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主要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窃取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结果，即苏联的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结果。

同时，也是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

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地主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并没有消灭，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伟大导师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列宁还指出：“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

产者。”^①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没收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严格的统计和监督，限制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的范围，坚持同资本主义势力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

列宁强调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列宁尖锐地指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②

①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② 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

在工资政策方面，列宁坚持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即国家工作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指示作出决议，规定人民委员领取的最高工资每月为五百卢布。列宁以身作则，坚决执行这一决议，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一九一八年三月，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布鲁也维奇，担心列宁的健康，与几个干部商量后决定把列宁的工资提高到八百卢布，列宁发觉后立即加以制止，指出这是“公然违法行为”，并宣布要给布鲁也维奇以“严重警告”处分。

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除了对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给以高额薪金外，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都领取大体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基本上贯彻了列宁关于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指示。

此外，列宁还积极支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号召苏维埃各级领导人、共产党员带头参加义务劳动，发扬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

十月革命后，列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大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粉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一批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复辟阴谋,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希特勒法西斯,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斯大林不愧为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苏联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还严重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占着优势。在经济领域内,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在农业中,集体所有制还占很大比重;在工业、农业和商业等部门都还存在一部分私有制。在工业中,一九三七年,苏联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 99.8%,个体手工业占工业总产值

的 0.2%。在农业中，一九三七年，未加入集体农庄的个体农户占总农户的 7%，其产值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 1.5%；一九四〇年，国营农业企业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 8.9%，集体农庄占 78.2%，个体农户和私人副业占 12.9%。在商业中，一九四〇年，各种商业在全苏商品流转额中所占的比重是：国营商业为 62.7%，合作社商业为 23%，集体农庄市场（自由市场）为 14.3%。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被取消，指的是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显然，当时的苏联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步。因此，在所有制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两种形式，这就决定了仍然需要实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更快地产生出来。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还缺乏经验，又没有任何别的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也由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

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斯大林在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对抗的阶级，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一致性而忽视了矛盾，不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问题仅仅看成是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相联系的问题。在分配问题上，没有坚持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对一部分人实行了高薪制度，扩大了差别。

因此，斯大林逝世以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已在不断地产生着，无产阶级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一些人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政治报告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

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

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要求在政治上的统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就是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苏共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本身就是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的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代表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苏修叛徒集团用突然袭击的方式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推行了一系列修正主义政策，不仅使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猖獗起来，而且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苏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们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部门，进行了

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換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們所不信任的干部打下去，把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安插到领导岗位上來。

经过一系列的变动，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一个新生的大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血腥地镇压苏联人民，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并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对无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法西斯主义。

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他们不仅要夺回老资产阶级所失去的生产资料，而且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

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攫为己有。

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任意侵吞苏联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一般工人、农民高几十倍以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侵吞国库，过着寄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勃列日涅夫与西方亿万富翁的生活方式毫无区别。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在国家银行里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帐户，他们可以在这个帐户内支取任何数量的卢布。在一种特殊商店里，他们每月初先支付几十卢布，然后可以随心所欲地选取精美食品。格鲁吉亚一个中央委员用五十多万卢布修建了一所豪华的住宅。这都是一些活生生的事实！

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们压迫、奴役、剥削广大人民。它们内部也充满着种种矛盾。他们为了拼命保住自己窃取的权力，狼狈为奸，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的处境越是困难，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愈演愈烈。

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攫取高额利润，维护

其反动统治，在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的同时，必然要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谋求世界霸权，推行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

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苏修叛徒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是根据这个阶级的利益决定的。

(二) 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苏联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苏联的实践经验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建立，才能巩固和发展。因而，苏修叛徒集团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国家政权就由无

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苏联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标志着所有制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为了使苏联整个社会经济完全适应他们对内剥削本国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他们利用国家政权，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大搞什么“经济改革”，实行什么“新经济体制”，改变企业的经营方针，扩大和强化人们相互关系方面和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实行全面的复辟，使苏联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完全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苏修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是和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不同的，它是由社会主义经济蜕变而来的。但它们的本质则是一样的。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里，除了国家垄断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垄断资本，而在苏联，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国家政权，把全部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产品分配权统统攫取过去，吞噬了苏联人民用血汗取得的丰硕成果，所以他们的垄断

程度更加高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苏修叛徒集团究竟搞了哪些“改革”?它是怎样把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又是怎样加强国家垄断资本的统治,加紧剥削和压榨苏联工人的?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说明:

第一,推行以“利润原则”、“物质刺激”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是从赫鲁晓夫开始实行,而由勃列日涅夫完成的。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就鼓吹修正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一九五六年二月苏修二十大上,他强调“必须彻底实行工作人员个人的物质鼓励原则”。一九五七年二月他提出要“扩大各企业和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权限”,把“赢利”作为“考核企业活动”的“主要指标”。一九六一年苏修二十二大,把赫鲁晓夫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为党的纲领肯定下来,鼓吹要“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利用”,“应当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等等。一九六二年九月,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真理报》刊登了苏修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抛出了一个以利润原则、物质刺激为核心的改革企业管理方法的建议。这个建议一出笼,苏修

报刊就连续发表文章，竭力吹捧。接着，赫鲁晓夫立即下令在乌克兰、列宁格勒等地进行试验。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以下简称“新体制”），把赫鲁晓夫推行的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系统化，并以党的决议和政府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一九六五年九月召开苏修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改善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十月又公布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条例》，要求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贯彻执行。

苏修叛徒集团为加紧推行“新体制”，自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先后发布了一百七十多个有关“经济改革”的“决议”、“指示”、“条例”和“办法”。一九六六年实行“新体制”的工业企业是七百零四家，一九七二年已发展到四万三千多家，占工业企业总数的87%，按生产量计算则占94%，没有改行“新体制”的仅是一些地方企业和实验工厂。“新体制”的“改革”在工业中已基本完成，交通运输业、邮电业的“改革”已全部完成。

苏修实行的“新体制”的主要内容是：

1. 通过利润、价格、信贷、奖金等经济手段加强经济刺激，鼓励企业追逐利润。

“新体制”把利润作为企业的主要指标。规定企业

利润除按提成上缴国家外，其余部分留归企业作为发展生产、物质奖励和福利设施的基金。目前苏修企业利润上缴给国家的部分约占60%，留归企业的部分约占40%，这部分利润完全由企业领导人支配，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为他们所攫取。

“新体制”规定实行新的价格制度，保证每一个企业在正常工作条件下都可以获得大体相同的利润。因此，许多工业产品特别是那些原来盈利较低或计划亏损的工业产品，大幅度地提高了批发价格。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曾两次大规模地提高重工业品批发价格。一九六七年整个工业品批发价格提高了13—15%，其中煤提高75%，黑色金属轧材提高35—40%，原油提高一倍。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调整了纺织、针织和制鞋工业的批发价格，轻工业批发价格平均提高了7.5%。

“新体制”规定，用银行贷款制度代替国家预算拨款制度。银行发放贷款时根据企业盈利水平，加以区别对待，利用信贷、利息等经济杠杆，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控制，鼓励企业追逐利润。

2. 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性”。

“新体制”扩大了企业的权限，规定企业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其财产。可出卖“多余”的机器设备、生产

工具、运输工具、原材料、牲畜、种子和其他物资；可出租“暂时不用的”厂房、仓库、生产设备、运输工具；可用“生产废料”自产自销计划外的产品，所获利润全由企业支配；可用自己的资金搞计划外的基建和购买设备；可从企业资产负债表上自行注销“无形陈旧”的厂房、设备、运输工具和其他器材。

企业有权自行确定生产财务计划、招收和解雇工人；自定企业机构、编制、工资水平和奖金；自订“无需上级批准的”产品价格，或同订货者“协商议价”，等等。

3. 扩大企业领导人的权限。

苏修《国营企业条例》规定，企业实行一长制领导，经理对企业“负全责”，可“无需委托、即用企业名义行事”。这就是说，企业领导人有权处置生产资料，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有权任意克扣工人工资等等，大大地扩大和加强了企业领导人的种种特权。

4. 实行“物质刺激”，加深对工人的剥削。

“新体制”规定，以获得利润的多少来确定职工的物质奖励，对工作人员实行“物质刺激”。苏修叛徒集团鼓吹要用“卢布教育人”，要“先好好干然后根据整个集体挣得的利润数额来分得自己的一份”。实际上，“物质刺激”是剥削和压榨工人的手段，它要从工人身上“得到百倍的回收”，如有些搞什么“谢基诺裁员试验”

的部门,发给工人每一个卢布的奖金,可以收回来十六卢布六十戈比。而对于那些企业领导人来说,企业获得的利润越多,他们的奖金越多,这正是他们任意侵占苏联工人的劳动成果,发财致富的合法途径。

从以上列举的一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新体制”的主要内容是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它的实质是彻底改变企业的经营方针,改变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对苏联人民的剥削。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方针应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企业虽然也要利润,但这是为了扩大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而现在,苏修企业生产的目的是完全与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它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满足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私利。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时曾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①今天,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规律在苏联又重新发生作用。苏修叛徒集团实施的“新体制”,把利润作为企业最重要的指标,用各种经济手段刺激企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9页。

业追逐利润，使企业的活动完全服从于扩大利润的需要。企业获得的利润，一部分以税金或上缴利润的形式交给国家，一部分留归企业支配。无论是上缴给国家还是留归企业，都是用来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并直接为他们所瓜分。因此，苏修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完全一样，目的都是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但在现在的苏联，在资本主义利润原则的支配下，完全违背了计划经济的原则。苏修企业竞相生产利润率高的产品，不愿生产利润率低的产品，一些人民生活必需品就由于利润率低而无人生产，各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受到严重破坏，生产一片混乱。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弄虚作假，是各企业牟取高额利润的手段。产品质量低劣，工艺落后，被人们称之为“傻大粗笨”。许多企业领导人片面追求利润，不愿提高计划指标，只要对他们无利就不愿采用新技术。实行“新体制”以来，苏联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更加严重，经济情况更是全面恶化。这是破坏计划经济带来的恶果。但与此同时，苏修企业的利润率却不断上升，到一九七三年，苏联工业部门的利润同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相比，剥削率竟高达200%，比老沙皇时期工业部门的剥削率，还要高一倍。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必须服从和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拨；人员编制和工资水平，都由国家统一规定。国营企业的性质，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国家政权的性质改变了，国营企业的性质也就根本改变了。今天苏修的企业名义上还是国家所有，实际上已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因为苏修实行的“新体制”，授予了企业领导人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经营和管理的一切权力，加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企业的控制。“新体制”规定，企业领导人有权出卖或出租生产资料，有权解雇和招收工人，有权确定工资水平，有权对工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或进行处分，这样企业领导人就独揽了企业的生产、财务、人事、分配大权，就和资本家的权力完全一样。苏修的一位经理有一句绝妙的自白，他说：“托拉斯就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苏联人民气愤地说：“我们这里，过去是资本家、富农统治，现在是新资本家、新富农统治着。”苏修企业领导人虽然不是以私人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但实际上，他们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企业的代理人。他们按照官

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来管理企业，剥削和奴役苏联工人，从中分得一份利润。正如列宁所说，他们“为掠夺而管理”，“借管理来掠夺”^①。苏修的企业既然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掌握，并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是地地道道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企业。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在企业中，工人群众和管理人员结合在一起，共同领导和管理企业。而今天，苏联工人阶级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苏修叛徒集团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扩大商品货币关系，使商品生产成为普遍形式，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支配着人们的相互关系，当然，劳动力也成了商品。苏联工人已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在苏修的企业中，厂长、经理独揽一切，不仅可以任意剥削工人，而且可以任意打击、处罚和解雇工人。据苏修报刊透露的材料，企业领导人经常辱骂工人，任意剥夺工人的奖金和给以罚款处分，有的企业又实行了侮辱工人的搜身制。在解雇工人时，老人、妇女尤其受歧视，有些工厂首先解雇多子女的女工、孕妇、生活困难的寡妇和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人。在哈萨

^① 列宁：《怎样组织比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

克帕夫洛达尔市肉类联合工厂工作的三名女工，因怀孕被厂长宣布为“不能工作”，一脚踢出工厂。复兴工厂一女工因孩子生病，没去上夜班，就被扣上“旷工”的罪名而被解雇。杜尚别纺织联合企业一少女工，由于没上夜班，不仅被赶出工厂，而且被剥夺了公民证，逼得她走投无路，在“另一个城市漂泊了两个月”之后，终于含恨自杀。此外，企业领导人还经常利用职权开除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职工，或借机打击报复，迫害工人。苏修自己也供认：“非法解雇职工的事，在许多州都存在。”可见，苏修特权阶层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往往比旧的资本家还更厉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现在的苏联，“按劳分配”已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既垄断了全部生产资料，又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他们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无偿地占有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

苏修特权阶层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附加津贴，获得高额收入。苏联工人最低工资是六十至七十卢布，党政机关部长一级的名义“工资”高达二千卢布。科学院院士的固定“工资”达一千五百至二千卢布，一般中等企业经理、总工程师的名义

工资是三百至五百卢布。除名义工资外，苏修特权阶层一般还领有其他名目的工资。如获得学位，有学位工资，博士每月一百卢布，通讯院士和院士是三百至五百卢布，兼职可获得兼薪，一人可领双份、甚至三份工资；那些所谓有高深知识、丰富经验的资产阶级分子还领有特定工资等等。这样苏修头目和一些院士每月的收入可高达五千至六千卢布，比普通工人的工资高出上百倍。此外，高奖金，高补贴也是苏修特权阶层获得高额收入的“合法”途径。奖金是按等级分配的。工资愈高，奖金越多。有些部门实行“新体制”，规定企业管理人员可获得基本工资 50%—100% 的奖金，而工人的奖金一般不得超过工资的 30%。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材料透露，一九六九年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工人得到的奖金只占本人工资的 4%，企业领导人获得的奖金却占本人工资的 40% 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工资的一倍到两倍。企业的领导人还巧立名目获取奖金和补贴，完成计划可得奖金，没完成计划可获得节约原料、材料奖金。休假有特殊照顾，生病不生病都可领医疗补贴，甚至连过生日都可以领到奖金。据苏修报刊一九七二年报道：日丹诺夫市亚速钢铁厂，就有一百八十二项奖金条例；利佩茨克一建筑托拉斯经理一个月就“巧妙地”获得七次奖金共一千四百多卢布；戈

米尔玻璃厂一季度发给管理人员的奖金就占他们工资额的147.2%，而工人却分文未得。据一九六六年七百零四个改行“新体制”企业的统计，企业领导人从奖金中分得81.9%，职工仅分得18.1%。工人反映：“‘新体制’的特点在于工人去完成计划，领导去拿奖金。”

除此以外，苏修特权阶层还利用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攫取非法收入。企业的经理、厂长，有的与私商集团互相勾结，盗卖工厂贵重设备、稀缺原料和商品；有的动用工厂的设备和原料，建立“地下工厂”，秘密生产各种畅销品，高价出售；有的与总工程师、总会计师串通一气，经常谎报“成绩”，骗取奖金；有的伪造职工名单，冒领工资，装进自己的腰包。有的甚至向工人敲诈勒索，规定每个工人每月必须向经理上交一定数量的卢布，如不交就有被开除的危险。农庄主席利用职权获得廉价建筑材料后，命令庄员无报酬地为他们盖别墅、房屋，供自己享受或高价出租。学校负责人受贿，录取不合条件的学生和出卖大学文凭。科学界的学阀、权威受贿，给不学无术的人以学位。教授、专家私人开业，捞取“外快”等等。例如第比利斯有一个大工厂的厂长，就花了一万三千卢布巨款，买通了一个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和教授，使他的女儿进

了医学院。这笔巨款，相当于一个普通苏联工人十年的工资。那个党委书记，正是通过招生受贿、出卖文凭等卑劣手段，大发横财，而成为家产达十四万卢布的富翁的。苏修特权阶层攫取非法收入的手法真是无所不有，其贪婪程度比起老牌的资产阶级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富人的天堂从来就是穷人的地狱。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工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收入很低，甚至连最低家庭生活也很难维持。苏联工人最低工资是六十至七十卢布，而苏修官方公布的一个人最低生活费用是五十卢布。目前苏联平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用的“经济困难家庭”约六千万至七千万人，占苏联人口的四分之一。这部分工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设法加夜班或上双班，有的甚至靠卖血来养家糊口。

今日苏联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富差别悬殊。这是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明显表现。

下面我们再从农业中看看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

在农业中，苏修叛徒集团也实行了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一九六五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主持召开了三月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

的刻不容缓措施》的决议，鼓吹“把赢利率水平作为客观评价农庄农场经营活动的基础”，“给农庄农场更多的经济自主性”。一九六七年四月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的决议》，规定农场只需完成向国家交售农产品数量的指标，有权自行制定生产计划，鼓励农场追逐利润，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到一九七二年底，实行“新体制”的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已有九千多个，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余单位，要求在一九七五年底以前必须改行“新体制”。

与此同时，在集体农庄中也实行了自定生产计划的制度。一九六九年苏修召开“第三次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的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规定国家只给农庄下达农产品采购任务；生产、销售、财务、劳动报酬等一切经营活动都由农庄自行决定。

在农产品销售方面，苏修积极鼓励发展自由市场。一九五六年颁布的《集体农庄市场标准条例》规定，集体农庄和个人可以按市场形成的价格在自由市场出售农副产品，禁止在市场上向交易者索取自产证。一九六七年又进一步规定国营农场也可以在自由市场自定价格出售“剩余”农产品。苏修商业部门的头目在报上公开鼓吹要在自由市场增加商品种类，几乎所有的

农产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一九六九年七月，全苏联共有七千五百个集体农庄市场，每年交易额达四十亿卢布，城市居民在自由市场购买的食品约占食品总量的20%。

土地的自由转让是苏联农业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苏修统治集团通过的《土地立法原则》规定，十月革命后全部收归国有的农村土地可以自由转让和变相出租，允许用农庄公共土地扩大自留地。

此外，苏修叛徒集团在农业中还实行所谓“小组核算制”，实行分地到组，包产奖励。农场、农庄把一定数量的土地和拖拉机等机器设备和工具固定给五、六人到十几人组成的小组，有的小组只有两、三人，这些小组在固定给他们的土地上自行安排耕种，农庄、农场只给他们规定总产量定额，按产计酬，超产奖励。

从以上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苏修在农业中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途径是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也还在鼓励发展私人经济的基础上滋生新的富农经济。

第二，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加强国家垄断资本的统治。

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由大企业兼并中小企

业，是苏修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新体制”推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一部分条件优越的大企业生产日益扩大，在整个经济中加强了垄断地位，而苏修工业中存在的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无法与大企业相竞争，赢利水平也赶不上大企业。由大企业兼并中小企业，就能普遍提高利润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保证苏修叛徒集团所控制的国家预算收入和他们的剥削收入。同时建立联合公司，也是苏修加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适应他们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

苏修建立生产联合公司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它的发展情况是：一九六一年在乌克兰里沃夫国民经济委员会开始建立了两个工业联合公司：一是“前进”制鞋公司，兼并了五个分布在不同城市的制鞋厂。另一个是“曙光”皮革公司，兼并了四个皮革厂。这种联合企业的建立是在“新经济体制”全面推广、特别是在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之后全面推广的。一九六八年五月苏修召开经济会议，决定全面推广建立大型生产联合公司的“试点经验”。苏修报刊竭力鼓吹“联合公司”可以使“中小型工厂加入具有大型生产各种优越性的现代化组织系统”，是“苏联工业未

来结构的萌芽”。一九七一年三月苏修召开二十四大，勃列日涅夫鼓吹“加强生产的集中是必要的”，联合组织和联合企业“应该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据统计，五十年代中，苏联共有二十多万个工业企业(交通运输及建筑业除外)，到一九七〇年，工业企业已因搞联合(实际上是兼并)仅剩五万个了。而联合公司近年来却有了很快的发展。六十年代全苏联合公司只有几家，到一九七四年初，竟激增至一千四百多家。一九七四年三月苏修又颁布了《生产联合公司(联合企业)条例》，决心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加速企业合并，发展联合公司或联合企业。据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苏《真理报》透露，这种联合公司又有很快增长，已达一千五百多家。

在农业中，苏修也广泛建立集体农庄合办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混合办的生产联合企业以及农业工业综合企业(或称“农业工业综合体”)。据统计，到一九七三年初，已经有四千五百多个庄际联合企业，有近千个国营农场和农庄合办的联合企业。据苏修报刊报道，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将建立一千一百多个生产肉、奶、蛋的大型综合体和工厂。

联合公司是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组织形式。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

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①苏修的联合公司就是以西方垄断组织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它包括工厂、科研和设计机构；它是由各企业各单位组成的统一的生产经营综合体。用苏修自己的话来讲，这是一种“独特的苏联式的康采恩”。

目前，苏修联合公司主要有三种类型：

1. 加入联合公司的企业完全失去独立性，变成了联合公司的一个生产单位。苏修大力推行的是这种形式的联合公司。

2. 加入联合公司的企业仍然保持独立性，联合公司只是一种共同的生产管理机构。

3. 加入联合公司的一些企业丧失了独立性，另一些企业仍然保持独立性，这是一种“混合性的、过渡性的”联合公司。

苏修的联合公司是规模巨大的垄断组织。如化学工业部所组成的“全苏联合公司”，就控制了化学工业系统的全部企业。石油工业部的二十一个“联合公司”，垄断了全国石油开采量的98%。又如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一个果品蔬菜工业联合公司，拥有二十二个罐头厂、二十六个专业化农场和农场一工厂、三十五个采购销售营业所、四个专业化汽车场，可见其垄断程度之高。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14页。

联合公司的建立,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造成了权力的集中。联合公司是由大企业兼并中小企业而形成的。大企业在联合公司中占有特殊地位,它的领导人一般就成为独揽联合公司大权的总经理。不少联合公司的经理,既是生产资料的直接支配者,又是各级党政领导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参加联合公司的其他企业和组织的负责人不但权力和地位削弱了,连工资也要按规定减少 10—15% 左右。因此,联合公司的建立,使权力更加集中在少数最大的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加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加剧了苏联资产阶级内部争夺权力和瓜分剩余价值的矛盾和斗争。

苏修对联合公司采取二级或三级管理制,二级管理制是部——生产联合公司;三级管理制是部——全苏工业联合公司——生产联合公司。扩大部一级的权力,撤销原有的生产总局这一中间层次,加强国家对联合公司的控制,这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加强国家垄断的重要措施,目前正在积极推行。

苏修联合公司的性质和组织形式表明,它完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联合公司的建立和发展,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的统治,加深了苏联工人阶级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加深了官僚垄断

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因而，苏联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使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入越来越深化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

第三，推行“谢基诺试验”，残酷剥削和压榨工人。

近几年来，苏修叛徒集团大力推广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的“裁员试验”。这是苏修推行“新体制”的又一重要步骤，也是加强对工人剥削的重要措施。所谓“谢基诺试验”，就是在“人要少、产品要多”的口号下，通过“合并工种，扩大服务范围”和“增加工作量”等加强工人劳动强度的办法来裁减人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①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冷酷地驱使工人在毫无劳动保护的環境中劳动。如在列夫达冶金金属制品厂的制钉车间，机床的撞击声两年可使工人听力减退；四、五年就变成聋子。它的镀锌车间，许多工人牙齿脱落，有严重肺病。在杰格佳尔斯克城的一个铜矿，三分之一的矿工三、四十岁就生颤动病。苏修推广的“谢基诺试验”，就是这样用加强劳动强度的办法，驱使工人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9页。

为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它完全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血汗工资制”的翻版。

“谢基诺试验”规定企业的工资基金总额不变。因裁减人员而多余下来的工资基金，留归企业支配，一部分用来支付完成谢基诺试验的工人的追加工资，但规定追加部分不得超过本人工资的30%。谢基诺联合企业的一个车间实行“试验”以来，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九年，每个工人的产量增加了2.2倍。这就是说，一个工人干了两个人到三个人的活，而获得的追加工资至多是30%。谢基诺联合企业共有七千人，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的七年中，共解雇了一千三百多人，平均六个人之中就有一人被解雇。而在职工人中，能够达到新的定额，获得30%追加工资的工人仅占1.4%。因而，大量裁减人员多余下来的工资基金绝大部分都落入了企业一小撮特权阶层的腰包。

苏修推广“谢基诺试验”加强工人劳动强度时，还大搞所谓“科学组织劳动”。他们把工人生产时手的动作拍摄成电影，测出“手的动作停歇的次数”，“制定工人手的动作图表”，然后迫使工人按照这种“科学”图表分秒不停地紧张工作。他们甚至发明一种控制摄影装置。这种装置每小时自动开关六十次，以便暗中监视工人的劳动，使工人不能有“片刻怠惰”。他们用带强烈

刺激性的声音和光线使工人每根神经都动员起来，坚持长久的紧张劳动。在用这种种“科学”方法榨取血汗的制度下，工伤事故大大增加，工人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一篇文章还宣扬说“作为物质奖励发给职工的每一个卢布可以收回十六卢布六十戈比”。其实，这正是以勃列日涅夫为头目的苏修新资产阶级压榨工人血汗的一种手段。

推广“谢基诺试验”后，大批工人被解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邦二百九十二个实行“谢基诺试验”的企业，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为止，就已经裁减了七万人。正当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被迫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之际，“谢基诺试验”的创始人，从化学工业部部长到联合企业的经理、厂长等人都获得巨额的国家奖金。“剥削有功，杀人有赏”，成了当今苏联社会的鲜明写照。

苏修叛徒集团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改革”，全盘改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并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

列宁在分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指出：“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

了。”^①又说：“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是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办法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另一方面保证（用秘密手段、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②苏修正是在这样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和经济组织，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今日的苏联是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天堂，广大劳动人民的苦役营。同时，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他们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疯狂扩军备战，向外侵略扩张的经济基础；他们的权力愈集中，垄断程度愈高，向外侵略的野心也更大，因而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富有掠夺性和侵略性。

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上仍是国有经济，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并不象私人资本家那样，以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来攫取高额利润，他们通过国家政权来控制经济，以高工资、高奖金、高补贴等“合法”和非法的形式，从分配领域获得剥削收入，他们这种剥削方式更隐蔽，因而也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3页。

②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3卷，第140页。

济实质决定了苏修叛徒集团政治上的极端反动，必然要实行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①

（三）苏修叛徒集团实行法西斯专政， 奴役各族人民

毛主席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苏修叛徒集团为了维护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不断强化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机器，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残酷镇压苏联各族人民的反抗和不满。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一九五六年召开苏修二十大，赫鲁晓夫一伙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大反斯大林。他们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斯大林。苏修叛徒集团对斯大林的恶毒攻击，集中反映了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就是否定无产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67页。

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五年九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大赦令，对在卫国战争中的叛徒，竟轻描淡写为“由于胆小或觉悟不高而被诱惑同占领者勾结的那些苏联公民”不问具体情节如何，都一律大赦。并规定，对“由于在德国军队、警察或特种部队中服务而被判刑的人，不问刑期长短，一律予以释放”。这就是说，凡是叛徒统统释放。苏修二十大后，更是大张旗鼓地为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阶级敌人恢复名誉，大批大批地为所谓“个人迷信的受害者”“恢复名誉”。一九五七年苏修副总检察长宣称：自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已经释放70%以上的在押犯，取消了三分之二的西伯利亚劳动营，目前拘禁的政治犯不到2%。这就是说，斯大林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关押的政治犯，绝大多数已被苏修叛徒集团释放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勃列日涅夫一伙公然为阴谋反对苏维埃政权而被处决的反动军人鲍·莫·杜万科“恢复名誉”，而对此人的判决还是列宁同意的。苏修叛徒集团还明目张胆地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举行纪念会，发表纪念文章，放映纪录片，发行纪念邮票，肆无忌惮地为那些早已被苏联人民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丑类歌功颂德，把他们无耻地吹捧为什么“英雄”、“杰出的俄罗斯战略家”，等等。

一九五六年二十大后，苏修叛徒集团废除了斯大林时期制订的“刑法”，大搞“司法改革”，取消了“劳动人民的敌人”的罪名，取消“剥夺选举权”等判刑条例。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却颁布了《关于国事罪的刑事责任的法令》，规定要严惩所谓“反苏煽动”、“聚众骚乱”的人，就是说，要镇压反对他们法西斯专政的革命人民。

苏修叛徒集团扩大法西斯专政机关，增设名目繁多的特务组织，加紧对苏联人民的监视、控制和镇压。一九五四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庞大的间谍特务机构，拥有几十万工作人员（即特务）。它派出大批间谍在世界各地进行阴谋活动；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等一切部门，到处都有它的特务组织和特务活动。它是苏修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一九六六年七月设立了“社会治安部”，一九六八年改名为内务部，这是专门的警察机构。一九六八年苏修通过了“进一步加强民警”的决定，扩大了民警权力，加强了民警的装备，在各大城市增设了摩托化民警部队，以“维持社会治安”。在内务部的控制下，还建立了各种非专业性的法西斯组织，什么“人民监察岗”、“人民纠察队”，什么“共青团基干纠察队”等等。苏修声称：这是“内务系统的重要组织”，“在民警机构中占重要地位”，他们帮助警察维持治安，

有权对居民进行“突然检查”，检查公民证件，监督苏修各种命令、决议的执行。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实行法西斯专政，竭力鼓吹加强“法制和秩序”，叫嚷“加强法纪和法制是一项全国性的、全党的任务”，要“加强生活一切领域的社会秩序”。一九六五年以来他们炮制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和条例。一九六六年九月通过了一个惩治“破坏公共秩序”的法令，一九六九年又搞了一个“预押法”。这个“预押法”规定，可以任意以“嫌疑者”的罪名拘留和审讯要加以迫害的人，对他们可以长期预押，如有反抗就使用镣铐、“紧身衣”，直至开枪。这就是说，他们随时都可以抓人、关人、杀人。

在这种反动统治下，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和“精神病院”。据报导，目前在苏联总共约有一千个集中营，关押了一百多万人。关进集中营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给治疗，还强迫他们“进行苦役”。如果有人稍微不满，特务马上进行刑讯，加以毒打，成千上万的苏联革命群众在集中营被活活折磨死。“精神病院”是变相的集中营，院长都是内务部的人。他们的“治疗”就是用各种烈性药物和毒品把一个人活活摧残死，或者弄得牙齿全部脱落，毛发掉光，终身残废。一位苏联伐木工人，只是因为说了几句热爱

斯大林的话，而被关押了五年。莫斯科的一名大学生说了一句“苏共已变成集权的官僚机构”，即被苏修当局定为“精神病患者”。有一个少将仅仅因为要求一点人权，就被送进“精神病院”。甚至有些著名的治疗精神病的专家，由于持有不同意见，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苏修叛徒集团经常调动军警部队、坦克、装甲车、甚至伞兵，对苏联人民的反抗进行血腥镇压。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在哈萨克的奇姆肯特市，就出动坦克和装甲车，镇压这个城市的工人群众，当场开枪屠杀了数十名工人，打伤和逮捕了许多苏联公民。一九六八年四月，苏修出动大批军警，用棍棒毒打手无寸铁的鞑靼居民，甚至使用了“有毒的液体”，而且一次就逮捕了三百多人。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苏修出动地方卫戍部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镇压示威群众，当场打死十人，打伤数以百计的人，许多人被捕。

列宁痛斥当年沙皇制度的黑暗统治时，曾经这样写道：警察的专横野蛮的迫害，“达到了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顽石也将为之长叹！”^①现在苏修新沙皇的法西斯统治比起老沙皇来，达到了更加“登峰造极的

^① 列宁：《内政评论》，《列宁全集》第5卷，第258页。

地步”。

苏修叛徒集团恢复了老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公开宣扬,俄罗斯民族理所当然应受到“各族人民的真诚尊敬”,非俄罗斯民族“是伟大俄罗斯的忠实儿子”,是“在伟大俄罗斯民族的领导下”的民族。他们采取歧视、迁徙、分化、监禁等毒辣手段,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压榨和迫害。据报道,苏修集中营中的“政治犯”有一半是“民族主义者”。在经济上,他们在所谓“经济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幌子下,摧残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使这些地区的经济畸形发展。列宁曾经指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①今日之苏联,又重新沦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苏修叛徒集团在文化教育、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们竭力推崇叛徒作家爱伦堡、肖洛霍夫等人编写的反动小说并拍摄成电影,丑化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奋战的苏联红军。他们为右派作家、黄色诗人翻案。他们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唯心论、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思想,他们利用宗教麻痹人民,苏修《共产

^① 列宁:《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2页。

党人》杂志公开鼓吹“由于一系列社会政治原因，由于相当一部分宗教人士政治方针的被迫改变，这就为共产党人和宗教徒的紧密合作和为进步的、人道主义目标的共同奋斗创造了有利得多的条件”，使得宗教迷信到处泛滥，教徒人数剧增，据统计，全苏联的教徒竟有五千万至六千万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大大超过了勃列日涅夫宣布的现有苏共党员一千四百万这个数目。他们为西方电影、艺术、文学作品的输入大开绿灯，大批腐朽没落的文化艺术搬上苏联的银幕和舞台，严重败坏社会道德风气。在教育界，他们废除高校招生录取具有两年以上工龄的生产者的制度，大搞分数挂帅、物质刺激，胡说什么“在学习中应当有一定的具体刺激，如果一个人看不到他的学习有什么意思，他就以冷淡态度对待学习”。

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苏修统治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对广大人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大肆宣扬入伍“光荣”，“不入伍就不配称为好汉”，军训是学校的必修课。除学校外，凡有15名16岁以上的青年的地方都要成立军训站，在中苏边界地区甚至把青年编成特别的组织进行军训。

就这样，苏修叛徒集团一方面打击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却扶植反革命文化，使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大肆泛滥，从而实现了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苏修叛徒集团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糟蹋得不成样子，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已付之东流。但是，苏联人民是受过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人民，绝不会长期容忍新沙皇骑在自己头上。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①

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历史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苏修叛徒集团在剥削压迫本国人民的同时，疯狂地进行侵略扩张，推行一整套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它肆意践踏“社会主义大家庭”各成员国的主权和

^① 毛主席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独立,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变为自己的殖民地、附属国,还妄想吞下整个欧洲。它完全继承老沙皇扩张主义的传统,妄想侵略我国,亡我之心不死。它大力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它勾结一切反动势力,镇压各国人民革命。它为谋求世界霸权,与美帝国主义既争夺又勾结,威胁一切国家的安全和独立,闹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又一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在对外侵略扩张方面,苏修野心更大,手段更为恶劣,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一)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又一个最大的 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

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垄断,侵略扩张是它的本性。斯大林指出,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它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正是这样,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不仅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30页。

残酷压榨和剥削本国人民，同时还变本加厉地实行资本输出，到处争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建立自己的新殖民统治，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

苏修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实行新殖民统治。苏修以“经互会”为工具，在“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从经济上全面控制了这些国家。近几年来，苏修又竭力鼓吹要在“经互会”内建立“共同所有制”，也叫“国际社会主义所有制”。所谓“共同所有”，实际是苏修一国所有。它要求“参加一体化的任何一个国家”，“对本国的民族财富都不具有支配作用”。这就是说，凌驾于“经互会”之上的苏修，却可以支配一切。苏修正是利用它在“经互会”的特权，对其他成员国进行骇人听闻的剥削和掠夺。它的主要手法是：建立“国际银行”、“国际经济联合公司”等类似“跨国公司”^①那样的国际垄断组

^① 跨国公司是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对外扩张和掠夺的一种国际垄断组织，它以一国垄断资本为主，通过对国外直接投资在许多国家或地区设立的分支机构，直接建立工厂，或与当地资本合资经营。跨国公司在当地用高价输入工业品，低价输出原料和掠夺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办法，获取高额利润；并且通过排挤和吞并当地企业，操纵和垄断所在国家的经济。同时，跨国公司还是帝国主义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工具。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建立的“国际经济联合公司”，就是对这些国家进行掠夺和控制的跨国公司。目前苏修建立的这种联合公司有：国际原子仪表公司、国际纺织机械公司、国际原子能发电联合公司、国际电子技术设备联合公司，等等。参加这些联合公司的有东欧一些国家的大型专业化企业。公司总部设在莫斯科，大权完全操在苏修手中。

织,在财政金融上控制其它成员国,进行高利盘剥;用“国际分工”、“对口联系”、“生产专业化”、“协调计划”等名堂,使这些国家片面发展单一经济,变成它的加工厂、果菜园和畜牧场。例如为了适应苏修需要,东德把六十家纺织厂改为电机厂。保加利亚片面发展农业生产,它出口蔬菜的半数以上和几乎全部烟草都供应苏修。蒙古片面发展畜牧业,每年必须供应苏修三百五十万头牲口,平均每一个蒙古人要为苏修饲养三头牲口。一九七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所欠苏修的债务相当于蒙古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人欠债高达一千六百多卢布。苏修还垄断“经互会”各国的燃料和工业原料的生产和供应。据统计,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期间,在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波兰、捷克五国燃料和原料进口的总额中,苏修供应所占的比重是:石油 93%、煤 61.9%、铁矿石 86.3%、生铁 97.5%、原棉 64.3%。苏修利用燃料和原料的垄断地位,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又从高价出售中获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在一九六一——一九七一年期间,仅从上述五种原料的交易中,就从东欧一些国家榨取了四十五亿美元。在对外贸易中,苏修通过所谓“长期贸易协定”,控制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大搞贱买贵卖,进行残酷的剥削。据估算,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

间,由于苏修不等价交换,使东欧一些国家蒙受的损失竟达一百九十亿美元。

近年来,苏修在“经互会”中,用什么“多边一体化”的名义,叫它的“兄弟国家”拿出人力物力到苏联的国土上开发自然资源,兴建大型企业。莫斯科报刊透露,苏修迫使东德、匈牙利、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家出人出钱出东西,在苏联兴建一条输送天然气的干线管道,从乌拉尔地区的奥伦堡通向苏联西部边境,长达二千七百五十公里。苏对此工程,只承担线路勘探设计的任务,东欧国家则分段包干全部管道的铺设和二十二个压气站的建设工程,而且要限期完成,负责到底。这是一种搜刮其“大家庭”成员国的“新办法”。用这种新办法,苏修把修建这项工程的重担全部压在“兄弟国家”的身上,自己从中得利,加强经济上的掠夺,达到政治上进一步的控制。拿东德和波兰作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了。为了这项工程,东德须完成五百多公里的管道铺设任务,须拿出四十万吨大口径钢管,派出六千名工人,支付十二亿卢布的资金。波兰的负担更重,它承担了两个工程项目:一项是从奥伦堡向西的第一段五百五十八公里长的最艰巨的输气管道铺设任务,包括建立五座压气站;另一项是在苏联境内修建一条通往波兰的输油管的任务。根据一九七四年底苏波签

订的“协议”，这一任务，波兰须在十几个个月内完成。波兰为完成这两项工程，须投资五亿卢布，须用外汇向外国进口管道等设备，还得调遣数千名工人到苏联去工作。苏修这种贪婪的搜刮行为，引起东欧国家舆论的不满，更加促进了“大家庭”离心倾向的发展。

苏修是凌驾于这些国家之上的太上皇。它发号施令，操纵这些国家的领导集团，控制他们内政。在蒙古，苏修一手策划了党内大清洗，把蒙古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的一些怀疑苏蒙“兄弟般友谊”的人清除出去；还派出上万名“专家”、“顾问”，直接控制其要害部门，这些人有权决定一切，可以否决蒙古领导人的意见。苏修在“军事一体化”的旗号下，利用华沙条约组织，从各个方面控制各成员国的军队，“华约”组织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总参谋长，从来就由苏修的军政人员充任。其它成员国的代表只能担任副职，有职无权，不过是个联络官。苏修还派出“专家”、“顾问”、“联合司令部代表”到各国进行监视和控制，并向各国派驻重兵，实行军事占领。蒙古不是“华约”成员国，苏修则通过双边条约，向这个国家进驻大批军队，把它变成反华的一个军事基地。

通过上述方法，苏修把“大家庭”的成员国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和奴役之下。只许他们唯命是从，不许

有丝毫的独立性；如有反抗，就实行所谓“国际专政”。一九六八年八月苏修以“华沙条约组织”名义，出动几十万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突然袭击和军事占领，用刺刀制造了一个傀儡政权，重演了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美帝国主义组织十六国入侵朝鲜的历史丑剧。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略和扩张。列宁指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苏修打着“经济援助”的旗号，大搞资本输出。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苏修给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就达八十二亿美元。垄断资本在以贷款形式进行资本输出时，除了获得很高利息以外，往往还规定对方必须以高价购买自己的商品，用资本输出来加强商品输出。列宁曾经形象地痛斥帝国主义：“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苏修也是这样干的。它比老牌帝国主义更加残酷毒辣，可以说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四张皮来。第一张皮，就是放高利贷。苏修的贷款，利息高、期限短，还乘人家困难之机敲诈勒索。印度到一九七二年三月为止共欠苏修三十八亿五千万卢比。印度每年需要偿还给苏修的借款和利息，已超过它每年所得到的苏修的贷款。印《观点》周刊对此分析道：“印度在获得苏联的每一百个卢比的援助款项时，它需要在同一年偿还苏联一百二十五卢

比。”第二张皮，苏修规定借它的钱就得买它的东西，而价格往往比国际市场高出20—30%，甚至高出两倍，这些商品质量很差，里边又有不少陈旧设备和卖不掉的东西。第三张皮，它要受援国被“援建”的项目必须生产有利于苏修的产品，并以低价卖给苏联。苏修帮助伊朗建成一条煤气管道，年产八十亿立方米，其中六十亿立方米要以低价送往苏联。苏修帮助阿尔及利亚修建一个白兰地酒厂，合同规定该厂新生产的白兰地酒要全部卖给苏联，一直到还完贷款为止。第四张皮，苏修还规定受援国必须用贷款雇用苏修“专家”，这些人生活水平比当地官员还要高，要汽车、要别墅、要特权，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苏修还通过“援助”，控制别国经济。据印度报刊揭露，苏修现在控制着印度机器制造业的85%，电器的60%，石油加工业的60%，钢产量的30%，电力生产的20%。这些事实充分揭穿了苏修所谓的“社会主义无偿经济援助”的谎言，说明他们是一伙罪恶的吸血鬼、寄生虫。

苏修除了以贷款形式进行资本输出外，还在一些国家直接投资，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企业”。据了解，苏修已在十几个亚非拉国家设立了“联合企业”。一九六七年在埃塞俄比亚成立了“埃夫索”贸易公司，苏修国际机械进出口公司的股份占这家贸易公司全部

股份的51%。一九六四年，苏修在尼日利亚同商人合办西非汽车工程公司，苏修资本占60%，控制了公司的董事长以及主管财务等重要职务。公司总部设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其他九个大城市设有分公司。苏修通过这个公司不仅推销汽车，还推销各种机电设备。一九六八年，它与新加坡合办苏新航运公司，一九七四年初又扩大为泰新苏航运公司，其中，泰国披尼父子公司的股份占51%，苏联和新加坡航运公司的股份占49%。此外，在印度、伊朗、几内亚、巴西等国都有苏修控制的“联合企业”。苏修在这些国家中搞的联合企业是“跨国公司”的翻版，是对别国进行控制和掠夺的“国中之国”。

苏修还以“军事援助”为名，高价出售陈旧武器，牟取暴利。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一年，苏修向第三世界出售的军火有一百四十八亿美元，占世界总销售量的37.5%，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之一。一九七一年印巴战争时，苏修趁机向印度大量输出军火，仅一九七一年底，运去的飞机、坦克、导弹，价值就有七亿五千万美元。在中东战争时，它不断提高武器价格，逼人家用现款外汇和低价石油买军火，还军火款，真是无耻已极。列宁在谈到帝国主义发战争财时指出：“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①现在苏修每一块卢布上同样也沾

^①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选集》第3卷，第588页。

染着这种可耻可憎的污迹。

贱买贵卖，投机倒把，是苏修掠夺第三世界的又一重要手段。据不完全的材料估算，从一九五五年——一九七二年的十七年中，苏修对第三世界不等价交换的剥削额达一百十三亿美元。伊拉克为了支付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中欠下苏修的军火债，不得不按削减价格卖给它一千三百八十万美元的石油，它一转手把这批石油以四千一百五十万美元卖给了西德，攫取了两倍的利润。苏修在一九七二年曾以四·六〇美元一担的价格从美国买进一亿四千万担的小麦。当国际市场小麦价格猛涨之后，它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又把其中一部分以一三·四〇美元一担的价格卖出，从中捞到二倍多的暴利。苏修这种投机倒卖的伎俩，连西方老牌垄断资本家也感到吃惊。

苏修对第三世界国家，不仅进行掠夺，而且还千方百计地进行控制、欺负、干涉和颠覆。

苏修打着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美、以侵略的幌子，以“军援”为诱饵，打入中东地区，在埃及、叙利亚先后建立了十五个海空军基地。在埃及一个国家中就部署了一万二千多人的导弹部队，派遣四千多名军事顾问，这些顾问甚至渗透到连一级的基层单位。一些重要作战命令，必须得到同级苏联顾问批准才能生效。它破

坏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把不战不和的局面强加给阿拉伯人民，借以控制阿拉伯各国。一九六五年印巴冲突后，苏修趁印度要求它帮助加强海军之机，在印度取得了使用一系列海军基地的权利。一九七一年和印度缔结条约，进一步加强对印控制；一九七一年底支持印度发动对巴基斯坦大规模武装入侵，肢解巴基斯坦，并乘机渗入孟加拉国，加强对印巴次大陆的控制。

当苏修的控制、干涉受到抵制时，它就搞颠覆。一九七一年，苏修在向埃及提供武器时竟然提出，在沒有得到苏联同意之前埃及不得使用这些武器的无理要求。当埃及总统萨达特拒绝这一要求后，苏修恼羞成怒，一手策划了推翻萨达特总统的政变阴谋。一九七二年七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宣布结束苏联在埃及的军事顾问的使命，给了苏修当头一棒。苏修的阴谋破产后，又对埃及不断施加压力，逼迫还债，停止供应武器和武器零件，妄图逼埃及就范。一九六九年，苏修驻几内亚大使参与谋杀杜尔总统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苏修操纵苏丹修字号党举行政变，要搞垮尼迈里总统的政府。一九七二年，苏修使馆有一百多人与企业图推翻玻利维亚政府的政变有牵连。一九七四年，南斯拉夫破获了苏修扶植的一个颠覆集团，苏修就气势

汹汹地在南斯拉夫边境调动军队，大搞演习，进行军事威胁。苏修的间谍网密布亚非拉和世界各地，仅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就有五百多名特务在干阴谋勾当。它还勾结各国反动派血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向以色列输送人力，支持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这大量的事实撕下了苏修自称是“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的伪装，暴露了它是第三世界最危险的敌人的真面目。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最大障碍。早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初，就把中国作为它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虽然他们的扩张阴谋接连失败，但仍然妄想搞垮社会主义的中国。他们公然造谣，胡说：“中国的边界就是离北京不到一百公里的长城”。苏修在邻近我国北部边境集结了上百万军队，修建了许多军事基地和导弹发射场，经常组织以我国为作战目标的军事演习，并接二连三地挑起边境武装冲突。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四年十月到一九七一年底，苏修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五千七百多起。同时，苏修支持我国党内修正主义头子的篡权复辟活动，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批林批孔运动，导演尊儒反法丑剧，不断派遣特务，窃取情报，进行破坏，阴谋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苏修

还操纵印度，胁迫日本，肢解巴基斯坦，控制印度洋和孟加拉湾，支持朗诺政权，渗透东南亚国家，直至同政治僵尸蒋帮集团进行勾搭，兜售什么“亚安体系”，妄图在国际上孤立我国。这一切都证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因此，我们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加强防御，准备打仗，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二)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新的 世界战争最危险的策源地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①帝国主义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是由于它的经济基础和侵略本性决定的。今天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是帝国主义争霸的继续和发展。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妄图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拉的称霸世界的大帝国。它加紧争夺欧洲，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区扩张，同美帝国主义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苏美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82页。

苏美争夺的重点在欧洲。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心脏地区。美国在欧洲有很大的经济利益，它海外投资的30%在欧洲，对欧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3%，而且，美国在西欧有盟主的地位，它至今力图保持这个地位。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都在欧洲，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有九个在欧洲。东欧一些国家是苏修的殖民地附属国，苏修一直想独霸欧洲、赶走美国。由于这些原因，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美苏在欧洲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夺，使欧洲地区保持着长期的紧张的军事对峙。美国在欧洲有几百个军事基地，三十万地面部队。苏修在东欧各国驻军有三十一一个师五十八万人。苏修75%的陆军、坦克、70%的飞机和90%的中程导弹都部署在欧洲一线，对准西欧。这几年，双方军事对峙有增无减，更加紧张。美国更新部署在西欧的战术核武器，一九七五年还将向西德增派两旅作战部队。苏修则继续加强驻东欧的军力，大量运进新式武器，并改进后勤供应系统，同时加强“华约”集团的军事演习，一九七四年的演习次数增加近一倍。它们召开什么“欧安会”、“中欧裁军会议”，恰好说明苏美双方都在紧张的扩军，欧洲很不安全，争夺到十分危险的程度。

为了争霸欧洲，在欧洲侧翼的中东、地中海和巴尔

干地区，苏美也进行着激烈的争夺。

中东石油资源丰富，油层浅，开采方便，成本低。美国在这里有大量石油投资，从这里进口大量石油。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石油大部分也来自这里。从战略上看，中东是欧洲的侧翼，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处，连接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是海陆空交通要道，对独霸欧洲，称霸世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苏美两家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争夺，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时，苏美两家的争夺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勃列日涅夫单方面宣布要派部队到埃及脱离接触地带，对中东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美国则立即回击，宣布驻欧三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大炮和导弹都对准苏联，载着核弹头的轰炸机不着陆飞行，随时准备进攻苏联。十月战争以来，双方运进这个地区的各种军火的价值达一百多亿美元。外交斗争也十分激烈，一九七四年一年之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七次进出中东，几乎跑遍了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首都；而苏修外长葛罗米柯和其他头目也多次到这一地区活动。有时一个前脚刚走，另一个就踩着他的脚后跟进来。他们为争夺中东，进行着频繁、紧张的外交角逐。

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海。地中海又是苏修南下通往非洲大陆和印度洋

地区所必经的海上通道。苏修为了进一步渗入中东、北非，从南面包围西欧，取得更大的势力范围，与美帝激烈地争夺地中海。两个超级大国的舰队经常出没在地中海，不断游弋，不断演习，造成了地中海的紧张局势。塞浦路斯是地中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国。一九七四年塞浦路斯发生军事政变后，苏修立即命令在地中海的一些军舰驶向塞浦路斯，宣布七个空降师处于戒备状态；并一再鼓吹要联合国派“特别使团”，千方百计挤进塞岛。更为恶劣是，它忽而支持甲方，忽而拉拢乙方，企图挑拨离间，把水搅浑。美国千方百计不让苏修插手，竭力要把解决塞浦路斯的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还在东地中海集结舰队，增加实力，与苏修相对峙。苏美在地中海的激烈争夺，使塞浦路斯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迟迟不得解决。这说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动荡。

在同中东紧密相连的巴尔干地区，苏修为了控制这一欧洲南翼的重要战略地区，加紧进行颠覆和侵略活动。它不择手段地在一个巴尔干国家竭力扶植亲苏势力，伺机夺权；在另一个巴尔干国家，软硬兼施，逼迫人家为它提供“军事走廊”。在上述阴谋败露、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它又气势汹汹地在这些国家的边境地区调动军队，大搞军事演习，进行露骨的军事威胁。

苏美的争夺遍及世界一切地方，从五大洲到三大洋，到处都是它们角逐的场所。海洋拥有丰富的生物和矿物资源，又是联系各大陆的重要通道，它的面积占地球面积的71%。苏修海军头目竭力鼓吹，海洋“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公然叫嚣“苏联舰队要航行在我国安全利益需要的一切地方”，加紧争夺海洋霸权。从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三年十年中，苏联军舰吨位增加近一倍，建立了随时能窜入世界各大洋的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北海舰队、太平洋舰队和专门赖在印度洋的分舰队、地中海特遣舰队。此外，还发展了庞大的商船队、渔船队和“研究”船队，这些船队既是苏修海军的“辅助力量”，又是伪装的间谍船。目前苏修舰只的数量已超过了美国，而且舰龄短，技术新。近年来，美国也在大规模地发展海军，加紧同苏修争夺海洋霸权。

随着双方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的加剧，两个超级大国都在继续疯狂扩军，谋求取得压倒对方的军事优势，特别是核优势。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公开叫嚷：“国防问题处于我们一切工作的首位”，“大量资金要用于国防”，使苏联的“防卫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依据苏修公布的数字计算，一九七四年的军费支出比一九五九年增加90%。据西方报刊估计，苏修每年的军费

支出，几乎与美国相当。一九七五年美国军费预算高达九百四十亿美元，苏修的军费近两年也在八、九百亿美元。苏修集中很大力量发展核武器，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三年的十年中，它的洲际弹道导弹增加了十四倍以上，在数量上已经超过美国。为在质量上赶上美国，近几年它又加紧试制多弹头导弹。一九七三年苏修进行了一百多次洲际导弹发射试验，试射导弹几百枚。苏美疯狂进行核军备竞赛，表面上却高唱“限制战略核武器”，这完全是个大骗局。一九七四年，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的会谈就是一场假限制真竞赛的丑剧。双方一致同意对战略核武器的运载工具进行“限制”，规定到一九八五年双方各自的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发射的导弹和载有核弹头的重轰炸机的总数不得超过二千四百个，其中只允许有一千三百二十个装上多弹头。这根本不是什么限制，美国现在已有二千二百零六个洲际导弹，还可以发展二百个，它装上多弹头的导弹已有八百二十二个，还可以发展五百个。而苏联从数量上看要削减一点，但正象西方报纸所说：“这仅仅意味着去掉那些过时的型号罢了”。它的多弹头导弹正在研制，当然大有发展余地。可见，限制是假，竞赛是真。它不过为今后核军备竞赛规定一个更高的标准，标志苏美开始了新一轮核军备竞赛。

在发展常规武器方面，苏美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苏修近年来常规武器发展较快。它的海军舰艇总数已经超过美国，现在正在加紧发展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艇，力图在这两方面也赶上美国。它还在加速研制各种新型的作战飞机，不断发展坦克、反坦克武器和各种防空导弹。

苏修花了那么多钱，搞那么多的原子弹，那么多的常规武器，它要干什么？就是要称霸，要战争，要杀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小撮寡头已经成为准备发动世界大战的罪魁。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这种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①。今天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它们既然要争夺世界霸权，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勾结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它们在世界上讲和平、讲缓和，恰恰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缓和，更谈不上什么持久和平。它们争夺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26页。

决不会安宁。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曾经指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①苏美两霸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它们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很可能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在增长，对此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但是两霸在本质上是虚弱的，它们的力量正在衰落。当前世界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反对苏美两霸的斗争蓬勃发展。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三、苏修叛徒集团内外交困，处于 “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这是我们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苏修叛徒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搞资本主义复辟，走帝国主义的老路，就必然陷入帝国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的冲击之中。在国内，它遇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阶级

^① 毛主席：《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578页。

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深化，人民的反抗斗争越来越激烈；在国际上，它为了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到处搞扩张侵略，激起了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抗。苏修声名狼藉，四处碰壁，日子很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深刻指出：“它做的坏事、丑事越多，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来得越快。”这就是新沙皇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

（一）苏联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行利润挂帅的“新经济体制”，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剥削和压迫苏联各族人民，使苏联的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

自从苏修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以来，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下降。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数字，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五十年代的10.3%，降为六十年代的7.1%和七十年代以来的5.2%；工业生产的增长率，由五十年代的11.8%，降为六十年代的8.5%和七十年代以来的7.1%。勃列日涅夫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常常采取压低年度计划指标的手法，以制造年年完成计划的假象，但有些项目仍然连压低了的指标还完不成。为了对外扩张侵略的需要，苏修统治

集团不顾一切地发展军火工业。据它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的二十年里,苏修把工业投资的85%左右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其中许多是用于军火生产。从工业总产值看,二十年来消费品产值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由30.8%缩小到26%。苏修领导集团一再许愿,要使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超过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但第九个五年计划施行了四年的结果,没有一年超过。民用工业常受到军火生产的冲击和排挤,计划屡屡落空。

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造成了苏联一般工业技术的落后。垄断价格保证企业能够获得高额利润,企业领导人往往不愿试制新产品和采用新技术。苏修报刊供认说,“如果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更新设备,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产量,减少奖金、利润,而这对企业领导人员来说是个灾难。”今日苏联有成千上万的廉价劳动力可供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只要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得高利润,企业领导人就不愿革新技术。此外,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任意提高新设备的价格。据苏修《货币与信用》杂志报道,苏联新生产的一种自动钻探机比目前广泛使用的钻探机,实际生产效率只提高一倍,但价格却高九倍。该杂志根据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中乌拉尔一百多家机器制造

厂的情况进行分析时透露，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价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占 10% 的时候，赢利率是 30%；但当这一比重增加到 50% 的时候，赢利率却降为 8—10%；为了追求高利润和高奖金，企业领导人自然不愿更新设备。据苏联报刊公布的材料，全国革新技术的计划年年完不成，每年注册的新技术项目大约有三分之二得不到实际采用，技术方面的创造和发明长期得不到运用和推广。工厂企业中设备陈旧，大量过时和超役龄设备得不到更新，手工劳动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严重破坏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这正是苏修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腐朽性的突出表现之一。

苏联的农业更是一团糟。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的十年中，苏联共进口粮食七千多万吨，开创了苏联粮食进口的空前纪录。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苏联的粮食出现了六年减产，其中四年下降幅度在 7—20% 以上，一九七四年比一九七三年就减产 12%，少生产粮食二千七百万吨，因此，苏修不得不进口大量粮食。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度，净进口粮食二千九百九十万吨。一九七四年，苏修又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大批抢购粮食，引起了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苏修今年（一九七五年）的粮食产量，从夏季情况来看，同样难逃减

产的厄运,因而他们又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抢购粮食,截至七月底为止,据已公开的材料估计: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政府证实,三国已向苏联出售了一千三百五十万吨的小麦和玉米。畜牧业的状况也不断恶化。猪的存栏头数一九六三年以来大幅度下降,至今仍未达到一九六三年的水平。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三年这十年期间,绵羊和山羊每年的存栏总头数都比一九六三年还低。

由于农、轻、重比例失调,生活必需品奇缺,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上还没有足够数量的必需品”。据苏修报刊透露,面包类食品供应不足,畜产品供应困难,日用品非常缺乏,连食盐、火柴等供应也经常中断。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〇年,六十多种主要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上涨了30%。由于国营商店经常没东西可卖,自由市场大肆泛滥,价格上涨更快,一九七二年,自由市场零售比国营零售价格高63%,有的商品甚至比国家价格要高出四倍到五倍。

连年疯狂扩军备战,工农业生产一团糟,使苏联的财政情况日益恶化。为了把经济困难转嫁到人民身上,苏修叛徒集团不断增加税收,仅居民税一项就从一九六〇年的五十六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一百六

十七亿卢布，即增加近二倍。《一九七三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透露，一九七三年，平均每个工人家庭所缴纳的居民税竟相当于他们工资收入的11%以上。苏修还滥发公债，逾期不还。到一九七一年苏修所欠的国内公债已达二百八十四亿卢布，其中二百五十八亿卢布经济公债已经到期，宣布拖延到一九九〇年才还清。由于外汇短缺，苏修不断向国际市场上出卖黄金。勃列日涅夫还经常亲自出马，到外国乞求贷款，被西方舆论讽刺为“寻求美元的外交家”。据不完全统计，苏修向西方国家借债共计一百四十六亿多美元。

列宁指出，失业后备军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只要资本主义一渗入，过剩人口就会形成”^①。现在，由于工业衰退，农业下降，就业逐日困难。苏修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在苏联“有些地区劳动力过剩”，“居民就业已成问题”。

在今天的苏联，由于企业领导人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工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被迫“自愿离职”，形成了严重的工人流动现象。工人在流动期间，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据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一九七三年报道，一九七二年工业部门流动的职工占工业职工总数的20%，即近六百五十万人。按每个职工每流

^①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45页。

动一次等于二十八天不工作计算，就相当于七十八万人全年没有工作。如果再把建筑业和其他部门职工流动数字加以统计，则情况更严重得多。

由于国际、国内政策连遭失败，经济困难日益严重，苏修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化和表面化。他们互相指责，互相推诿罪责，闹得不可开交。领导集团明争暗斗，政局动荡不稳。例如，勃列日涅夫指责柯西金主管的工业“存在着需要全党、全民克服的缺点”，柯西金则抱怨勃列日涅夫抓的农业落后，“影响了其他经济部门”。勃列日涅夫为自己内外政策的失败寻找替罪羊，一九七三年把农业部长马茨凯维奇赶下台，把波利扬斯基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降职为农业部长；随后，谢列斯特和沃罗诺夫又被赶出政治局；不久前又解除了谢列平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近几年来，勃列日涅夫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突出自己，而他的对手们也利用各种机会向他挑战。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克里姆林宫内激烈地进行着。

苏修经济状况的严重恶化，是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苏联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尖锐矛盾的反映。可以肯定，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必将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之中。

(二) 苏联人民反抗苏修叛徒集团的革命斗争不断发展

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促使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具有光荣十月革命传统的苏联各族人民已经开始觉醒，正逐步认清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面目，用多种方式进行斗争。革命浪潮此伏彼起连续不断，革命的烈火遍及全国各地。

工人阶级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列。许多地方的工人蔑视苏修的劳动纪律，用怠工、旷工、罢工等方式表示不满，进行反抗。有的地方罢工甚至发展成为游行示威、抗暴起义。一九六七年六月在南哈萨克奇姆肯特市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暴斗争。愤怒的群众袭击了市民警总部和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并烧毁了这两所建筑物。随后又举行规模盛大的政治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遭到苏修当局坦克车、装甲车的血腥镇压，几十人惨遭杀害。同年十一月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数千名工人也举行了罢工。一九七三年二月，维切布斯克市一家最大的工厂发生了罢工，反对厂方新规定的使各项主要专业工人的工资又减少20%的计件工资定额，迫使厂方恢复了原来的计件工

资定额，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在斗争中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一九六八年以来，苏联的一些革命组织一再发表文章和传单，号召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打倒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不断抵制和反对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实行的侵略扩张政策。有的革命组织曾发表文章和传单，强烈谴责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华罪行。一九六八年八月，当苏修当局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新西伯利亚等重要城市都出现了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一九七〇年二月，当波兰工人阶级掀起革命风暴时，在加里宁格勒、利沃夫和白俄罗斯的一些地方爆发了声援波兰工人的罢工。

苏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民族政策，实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俄罗斯和非俄罗斯民族之间散布仇恨的种子，使民族矛盾日益加深。近年来，苏联各少数民族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不断增多，规模迅速扩大，斗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久。

一九七二年，从乌克兰到中亚，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高加索山区，各少数民族的斗争互相呼应，持续不停。立陶宛考纳斯市的数千人走上大街，高呼“给立陶宛自

由”的口号游行示威，冲击苏修的市党委和警察局，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和伞兵搏斗。拉脱维亚的十七名老党员联名向国内外发表长篇信件，揭露苏修背叛马列主义和强行同化少数民族。爱沙尼亚塔林市的大学生举行示威。乌克兰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一万多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砸了苏修州党政机关的办公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厦，撕毁勃列日涅夫等人的画像。在高加索和中亚一带也不断出现抗议活动。

苏联知识分子对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法西斯统治也强烈不满。许多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谴责苏修统治集团搞白色恐怖和疯狂扩军备战。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和其它一些城市的青年学生，近几年来不断举行抗议活动。就是在苏修的军队中，也产生了动荡现象。侵捷的苏军士兵中出现了自杀和逃跑的情况，不愿充当苏修的侵略工具。一九七〇年波罗的海潜艇舰队的四个军官因组织《争取政治自由战士联盟》而被捕审讯。

总之，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反抗苏修新沙皇的革命斗争不断发展。苏修叛徒集团正坐在火山口上，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它们的统治是决不会长久的。

(三)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处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

苏修新沙皇疯狂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加紧同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肆意剥削和奴役别国人民，激起了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不满，他们越来越看清苏修是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帮助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号而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纷纷起来反抗。第三世界许多国家舆论指出“苏修同美帝一样是帝国主义，必须警惕”，“苏联领导人与老沙皇毫无差别”，“是个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假朋友”。一九七二年七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团在埃及的使命”，请他们卷起铺盖滚蛋，充分表现了埃及人民反对苏修控制干涉的坚强意志。十年来，有四十多个国家宣布赶走苏修披着“外交官”礼服的间谍和特务。一九七三年九月召开的有七十多个国家参加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一次声讨会。会前，苏修企图以观察员身份挤进会议，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勃列日涅夫气急败坏，立即给会议主席布迈丁写了一封“高压信件”，威胁会议不许把苏联和“资本主义强国相提并论”，不许把世界划分为“大国”和“小国”，“富国”和“穷国”，激

起了第三世界的公愤，纷纷谴责“苏联是帝国主义”。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明确指出：“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少数富国旁边存在着多数穷国的世界。”狠狠打击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嚣张气焰。

一九七三年十月阿拉伯国家冲破苏修的重重阻挠，进行了气壮山河的反对以色列武装侵略的战争。许多国家舆论揭露苏修为在中东扩张，伙同美国制造不战不和的局面；趁阿拉伯国家迫切需要武器之机勒索高额现汇；向以色列继续输送犹太人等一系列罪行；指出这是“在阿拉伯国家背后捅了一刀”，是阿拉伯人民“更加危险的敌人”。

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底举行的第七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不顾苏修美帝的干涉，通过一项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决议，强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会议还就加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阿拉伯同非洲国家的团结等问题，通过了一系列积极的决议。这对处心积虑破坏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妄想主宰中东的美帝和苏修，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一日，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了非洲统一组织第十二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

团结反帝、反对种族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愿望和决心。在这次会议前夕，苏联政府却伪装支持，递送一个“特别文件”，把参加非洲统一组织的各国，划分为“进步成员国”和“非进步成员国”，妄想使用破坏非洲的团结、分裂统一组织的手段，达到操纵会议的目的；“特别文件”竭力向非洲各国兜售“缓和”、“裁军”等破烂货。与此同时，苏修却又插手安哥拉的独立事业，挑拨安哥拉三派（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关系，挑动安哥拉内战。苏修抛出“特别文件”的卑劣行为，引起了非洲国家的强烈愤慨。一个参加非洲统一组织会议的外交部长谴责“特别文件”“坏透了”。另一些代表明确指出“这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对非洲的新殖民化”，“完全是虚伪的支持，真正的贩卖”。

在亚洲，英雄的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老挝人民紧密团结、相互支援、相互配合、共同战斗，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抗美援朝正义斗争的伟大胜利。柬埔寨、越南南方已经全部解放，老挝形势空前大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亚洲人民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历史潮流，正滚滚向前势不可挡。亚洲的国家和人民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对新老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也有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他

们绝不会容许“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局面出现。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苦心兜售了五、六年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遭遇很可悲。至今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支持者不过一两家。亚洲人民尤其是东南亚许多国家公开声明，对“亚安体系”不感兴趣，它们“不赞成”、“不参加”“亚安体系”。

在联合国第二十九届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出席大会，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力。第三世界各国还在会上痛斥了苏修阻挠修改联合国宪章的种种谬论，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修改宪章的提案。联合国曾经是苏美争霸的工具，现在联合国正在成为第三世界揭露、控诉、谴责两霸罪行的重要场所。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海洋法会议、世界人口会议、世界粮食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团结战斗，共同反霸。他们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地痛斥两霸剥削和掠夺第三世界的强盗行径，使美帝、苏修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和惨败。

苏修同它那个“大家庭”的成员矛盾重重。东欧的离心倾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正在发展。东欧各国都在极力冲破苏修的控制，直接同欧洲共同市场挂钩，同西方发展贸易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经济关系。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华约国”外长会议上，

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打着“加强团结”的幌子，企图加强控制，阻止东欧各国与西方日益扩大交往的趋势，而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外长表示反对，提出要认真讨论西方提出的自由交流情报和思想的建议。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殖民统治的斗争不断发展，一九六八年苏修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来，捷克人民以各种方式反对苏修占领的斗争从未停息。

苏修的疯狂扩张直接损害了第二世界国家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反对苏修渗透、分化、干涉、威胁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许多西欧国家看穿了苏修声东击西、争霸欧洲的图谋，看穿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①的骗局。欧安会的第二阶段会议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开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廿一日，花了二十二个月的时间，经过三十五国^②的三百七十五名代表开了二千四百次会议，用掉了四万多公斤纸张，终于收场。七月三十日，又在赫尔

① 欧安会是苏修在1966年首先提出的，但它不提要美国也参加。1970年苏修集团才表示美国可以参加并在1972年与美进行交易，同意欧安会与中欧裁军会大体同时分别召开。1972年11月开了欧安会筹备会。1973年7月开了欧安会第一阶段会议，通过议程。1973年9月，开第二阶段会议。

② 欧洲31个国家（包括梵蒂冈）加上美国、加拿大、土耳其、塞浦路斯。阿尔巴尼亚拒绝参加，未列入。

辛基开起了第三阶段会议。第三阶段“欧安会”却只开了三天，八月一日即告结束。“欧安会”产生了一个长达一百二十页、共三万字的“最后文件”，其正式名称叫《指导与会国间关系的原则的宣言》。“最后文件”冠冕堂皇地罗列了十项“原则”，包括：主权平等和尊重主权固有的权利，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国家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各国人民的平等和自决权，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忠实履行国际法规定的各项义务。这类原则，只是联合国文件的翻版罢了。但是，苏修头目却开动宣传机器狂热吹捧这个“最后文件”。勃列日涅夫把它说成是欧洲“各国在今后几年内，也许是几十年内”的行动“纲领”。苏修报刊把它们吹嘘为“欧洲和平共处宪章”。然而两个超级大国的一贯行径，却从来都是侵略和掠夺，压迫和杀戮。今天欧洲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来自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争夺，主要是来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多的西欧人士认识到，在两霸激烈争夺欧洲的情况下，“欧安会”根本不能保障欧洲的安全、维护各国的合作，反而带来危险。尽管三十五国的国家首脑或代表都签署了这个“最后文件”；但从各国代表在会上的发言看来，各国首脑对文件的解释很不一致。西欧国家对会议结果表示

了极大的保留和警惕。法国总统德斯坦说，“文件本身并未给和平带来保证”，“巨大的军备努力仍在继续进行”。法国“必须保证它的独立的国防”，“为它所属的（北大西洋）联盟的生存作出贡献”。西德总理施密特说，对会议结果“抱过高的直接的期望是错误的”。英国首相威尔逊强调，西欧国家要“不断加强警惕，加强基于力量、基于团结的警惕”。一些欧洲的中小国家在会内会外特别强调维护主权独立和反对霸权主义。欧洲各国舆论，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欧安会”是苏修夺取欧洲的“圈套”，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局”。美国《时代》周刊最近透露：前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莫斯科时曾经问勃列日涅夫，苏修为何如此急于搞“欧安会”。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文件，我们需要一个文件”。可见苏修要的不是什么欧洲的安全与合作，而是拿着一个骗人的条文，来掩盖苏修对欧洲的侵略和扩张，欺骗和麻痹人民，实现其独霸欧洲的野心。欧洲国家认识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威胁的现实性和危险性。目前西欧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合作，共同抗苏的趋势正在高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已经由六个增加到九个，并且要在一九八〇年前把一个主要是经济集团的“共同市场”建成一个政治性的“欧洲联盟”，在世界上“要以一个声音说话”。日本人民连续不断掀起要求苏修归还北方四

岛的斗争浪潮。他们成立团体，游行集会，发表声明，愤怒声讨苏修的霸道行径，并坚决反对“亚安体系”，日本政府还一再要求苏修停止在日本附近举行军事演习。

这一桩桩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苏修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它的反动本质越来越暴露，名声越来越坏，反对它的人越来越多，黔驴技穷，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已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毛主席英明指出：“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①苏修貌似强大，气势汹汹，但本质是虚弱的。苏修走上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受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同样也逃脱不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可耻下场！

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蜕变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严重教训，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

^①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的一次谈话，引自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记。

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研究苏联变修复辟的过程，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必须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苏联的实际生活完全证实了列宁的光辉论断。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断地产生出来，这就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毛主席及时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反面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制定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

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上层建筑的有些方面，资产阶级往往还占优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在产生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些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不加限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苏修叛徒集团就是通过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扶植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林彪反党集团也是利用资产阶级法

权思想来煽动和挑拨一些蜕化变质分子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因此，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扩大？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记取苏联变修的教训，坚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断地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合理地逐步地缩小党的、国家的、企业的、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发扬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思想腐蚀。要坚决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通过广大干部走“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赤脚医生、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等等，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要经过长期的斗争和改造，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国内外阶级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产阶级亲自出马要好得多。在苏联，十四国的武装干涉、白匪的叛乱、希特勒几百万军队的进攻，都没有能够攻破的社会主义堡垒，却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一小撮

叛徒从内部夺取了。因此，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①，“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②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但是，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反映这种矛盾和斗争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林彪、刘少奇那样的人物还会产生。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把反修防修的斗争长期进行下去。

修正主义者不仅代表着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他们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总是要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分裂活动和阴谋诡计。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① 见《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

② 见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为了识别林彪一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进行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多次号召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最近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再一次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指出了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我们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作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认真看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使学习不断深入下去,真正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搞清楚。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需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巩固政权同样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团结群众。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路线。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真正动力。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这个专政的性质决定它必须依靠群众和团结群众。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要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要求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团结广大群众。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亿万

群众参加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运动。实践证明，没有广大革命群众的参加，要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要搞清楚，“要使全国知道”。这就是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团结广大群众，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工人阶级深受旧社会的苦，对旧社会有无比的痛恨，对新社会有无比的热爱。我们决不容许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在我国重演。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搞清楚，为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努力奋斗，作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成为一个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永远不做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努力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